调查研究

探索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新路径

□ 邓 洲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一般出现在一国工业化的中后期，同时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我国而言，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的必然举措，也是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变革，对于积极应对当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服务业转型发展与优化升级，以及提高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是历史趋势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并非现在才出现，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融合的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当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水平的限制和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融合方式有明显区别。

总的来看，虽然工业化早期就会出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结合，但普遍出现融合趋势则一般发生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在融合程度上，受技术进步和业态创新的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层次不断加深，由初期的浅层次结合，逐渐发展为深层次融合。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对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强、更容易实现融合。在融合的具体路径和形式上，表现为产出融合和投入融合。产出融合，是指制造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融合，最终产品是包含实物产品和相关服务的“产品包”；投入融合，是指专业化的服务要素深度参与到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产品一般不会包含相应的服务，产品附加的服务和产品本身完全隔离，能否提供相应的服务与产品本身的生产、销售以及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等，没有明显的关系。在制造企业内部，生产过程对服务的需求也比较少，一般是通过内部提供的方式得到满足。但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特别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制造业需要更为专业的服务要素供给，由此，专门的服务企业或者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的服务部门，成为制造业服务要素的重要供给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产品中“制造”和“服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目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投入融合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增强。家电、汽车、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工程机械等产业率先出现不同程度的服务化转型；设计、研发、实验等专业化服务，检测、维修、部件定制、工程总承包、交钥匙工程、整体解决方案，以及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优化等，是当前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一批领先的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运用服务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服务质量的差异化也对提升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的新业态正在成为制造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意义重大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破除现存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制约、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适应新的国际产业分工环境和秩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助于破除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市场环境有待优化、创新动力尚且不足等方面的挑战，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更多的服务要素投入制造业，将对节能减排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形成集约使用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方式；研发、设计、专业管理等服务能够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增长点，以抵消传统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继续教育、金融租赁、工业地产等服务业更好发展也有助于制造业优化劳动力、土地要素的结构；制造业国内市场的发展需要渠道建设、诚信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需要相关服务业同步发展提供支撑；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成果交易、专利申请、标准制定等对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造业与相关技术研发、技术中介机构等服务部门和企业深度融合，可提升制造业自身技术研发部门的水平，加强其与外部科技资源的联系，从而加快制造技术的研发和转化。

二是有助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优化升级。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总体上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中低端生活服务业所占比例大，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服务所占的比例较低；研发、设计、咨询、法律、财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产品本土供给不足；服务业外向型程度较低，服务业产品的出口比例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大，但人力资源水平低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为国内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由制造业剥离出来的服务环节和项目能够为国内服务企业提供智力和资金支持，制造业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带动服务业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这些都有助于国内服务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三是有助于我国应对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当前，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的特征和趋势：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不断提高，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出现服务业转移的新趋势；很多发展中国家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形成竞争压力；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推行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在此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能够改变传统的依靠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缓解要素成本上升削弱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内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借助制造业已经形成的国际技术链、供应链、销售链网络参与国际分工，同时促进我国优势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探索融合路径、找准发力点

更好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需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融合路径。

要探索要素结构提升的融合路径，通过增加服务要素供给比重以及更好的服务，改变我国制造业依赖低成本要素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要素结构，突破技术约束，切实发挥研发设计等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探索用户价值提升的融合路径，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信息增值等融合模式的应用，提升最终产品或产品组合的价值；要探索制造效能提升的融合路径，针对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以及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要求，可重点探索低成本大规模定制、供应链整合和网络协同制造等融合模式，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效益；要探索拓展服务提升的融合路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业态，比如金融租赁、资源网络化和服务外包等，这将有效弥补服务业结构短板，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

更好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需找准发力点。

一是着力破除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层面的融合发展规划，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提供金融支持。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税率不同、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对此需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融合的重要载体。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进程看，新的融合模式总是出现在代表当时技术、市场发展方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实践的触发点。对此，需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在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计划时，亦要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作为重点方向，着眼于构建涵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单一制造业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三是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相比于商业等服务业，我国制造业业态创新的步伐较为滞后。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和信息化融合的深度，实施相关政策促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金融服务等环节，贯穿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

四是积极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制造业服务外包是国际服务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部分。目前，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处于调整阶段，这为我国通过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制造业服务分工提供了重要机遇。可考虑借助已有的服务外包试点城市，加大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企业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合作与联盟，建设和推广国家制造业服务外包公共品牌，吸引优质要素投向生产性服务部门。同时鼓励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在岸服务外包，开拓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需市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撷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 涛提出：

用改革办法挖掘消费潜力

当前，制约我国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无法有效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监管体制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的改善；等等。

对此，要下大气力，运用改革的办法，切实将消费潜力挖掘出来。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相关制度，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更为科学合理的假期制度安排，支持有具体消费场景的消费信贷发展等，有效增强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二是在大幅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进重点领域商品和服务标准建设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满足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三是在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推动消费者维权机制改革等方面，采取务实举措，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软硬件环境。

与此同时，还需高度重视农村市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效激发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应该看到，我国农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速度很快。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城镇居民的46.5%，但名义增速为8.7%，快于城镇居民2.3个百分点；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当于城镇的16.9%，但名义增速为9.1%，快于城镇0.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梯度追赶型特点，更好激发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势在必行。

为此，要更好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趋势，加快商品消费的升级换代，培育发展通信、文娱、旅游等服务消费，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向农村地区进一步延伸和覆盖，健全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改造和提升农村地区交通、信息、金融等方面的设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向东提出：

充分发挥会展平台的窗口作用

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货物贸易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30万亿元，成为全球13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市场、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国际会展平台，积极与世界各国伙伴做生意，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许多外国企业也利用这些机会，向中国的采购商推介产品和服务。可以说，这些会展平台在推动我国形成“买全球”“卖全球”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持续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各地举办的各类会展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要和开放举措，以适应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要求，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是由出口导向转为进出口并重。随着经济开放度越来越大，过去主要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逐步转向举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出口并重的趋势明显。二是由综合交易扩展到专业多样。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和“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过去以商品综合交易为主的博览会逐渐转变为分地域、分行业以及分交易类型的展销会，更聚焦细分领域和专业市场。三是由现场展幕拓展到网络平台。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会展呈现出网络化、智能化的特点，为打造“永不落幕”的各类博览会提供了便利。以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贸易平台涌现，使得会展业由现场有限的展位拓展到无限的空间，让更多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会展平台接触到全球市场，也让更多新产品或新技术更便捷快速地展现给消费者，从而使会展平台成为推动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未来，我们需进一步利用好会展平台的窗口作用，促进内外贸市场一体化发展，推动对外开放走深走实。

本版编辑 栾笑语

实践真知

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产业振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

产业兴、百业兴。只有产业兴旺了，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要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产业兴旺下功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推动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农村一二三产业布局尚不协调。一产向后延伸不充分，多以供应原料为主，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不健全；二产连接两头不紧密，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副产物综合利用程度较低，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较低；三产发育不足，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能力不强，产业融合层次低，乡村价值功能开发不充分，农户和企业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

二是农村产业在类型、规模等方面不全面不平衡。一些地方的产业较为单一，仍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其他产业基础薄弱。即使仅看传统种植业，很多地方在经营模式上也表现出耕作方法陈旧、种植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在经营方式上依然较为粗放，集约化生产程度和水平较低，化肥、农药用量大，造成环境污染与土地质量退化。

三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各种因素较多。一方面，农村产业发展普遍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既缺少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经管、营销、电商、金融等人才，也缺少与乡村产业发展相契合的本土实用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较为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建立，金融服务明显不足，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尚未打通。此外，一些现代农业配套设施用地和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难以满足，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需进一步提升。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更好推动产业兴旺，需紧密围绕广大农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要面向市场、围绕需求发展农村产业。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大力发展绿色、优质、特色农产品。既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不断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又要积极推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将生产、加工、仓储、运输等聚集整合，不断延伸种养产业链条，加快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居民俗、康养基地等新产业，拓宽农业增收渠道；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运用电商模式，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能力和效益，更好地让农民分享农产品的增值收益。

第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需下决心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完善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继续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深入开展统防统治，减少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坚决打赢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第三，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要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加强农业科研人才培养，稳步推进产学研项目的实施，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农业科研成果转化速度，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大力推广农业节水技术，完善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建设和水利建设，提高农业防灾和抗灾能力；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智能化水平，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一方面，要加快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让乡土人才成长起来，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另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好相关政策，特别是《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引导更多青年人返乡下乡创业，给予他们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吸引其扎根农村，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中坚力量。

第五，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农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引导农户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格局；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加快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综合运用担保、贴息、保费补贴等金融杠杆政策工具吸引民间资本，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入力度，优先支持现代农业和新型乡村产业发展。

（执笔：朱晓娟 姜文来）